

谄佞之风与盛唐之衰

于汝波¹ 高润浩²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 北京, 100091;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唐朝玄宗统治时期, 出现了“开元之治”的兴盛局面, 这是唐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 “突如其来”地发生了“安史之乱”, 这场动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换点。为什么正值鼎盛的唐朝会发生遽变? 是什么导致了社会动乱和盛唐之衰? 本文从大战略的高度, 对玄宗后期亦达鼎盛的谄佞之风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及其危害进行系统考察, 揭示了谄佞之风与盛唐之衰的内在联系, 论述了关于铲除此风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 盛唐; 衰弱; 谄佞之风; 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古代中国, 以唐为盛; 唐朝之盛, 又以“开元之治”为其巅峰。唐初, 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 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经高宗、武后、中宗的发展, 遂形成玄宗前期政治稳定、经济富足、军事强大的“开元之治”。就在唐朝步入鼎盛, 人们希望“赶上了盛世享太平”之际, “渔阳鞞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 爆发了变“盛世”为“乱世”的“安史之乱”。叛乱过后, 唐王朝一蹶不振, 昔日的兴盛局面再也没有重现。盛唐的遽衰, 既让人们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同时又让人们苦苦思索: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盛唐之衰? 它给后人留下了哪些有益的启示?

正如任何单一因素无法造就兴盛一样, 任何单一因素也难以导致衰弱。任何企图把盛唐衰落的原因归结为单一因素的努力, 都势必把历史简单化, 势必犯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里德所称的“单一因素解释的谬误”(Fallacy of the single factor)。盛唐的衰弱, 不单是由玄宗后期的骄奢淫逸, 或者是奸臣弄权,¹或者是边将权力过大²等某一因素造成; 实际上, 导致盛唐衰弱的原因是复合性的, 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 导致衰弱的因素不断增多。对这些因素进行研究, 无疑有益于深化对上面所提问题的认识。本文试从大战略的高度, 以谄佞之风与盛唐之衰的关系为切入点, 对玄宗统治后期的谄佞之风进行历史考察, 分析其形成原因、社会危害及教训, 以期对生活于盛世的人们有所警示。

一

谄佞现象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一种常见病。因此, 凡有所作为的明君贤相, 都把抑制谄佞作为励精图治的首要任务。先天二年(712年), 姚崇在任相之前与唐玄宗的一段对话, 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当时, 玄宗在新丰(今陕西临潼)讲武, 这位年轻的君王召见了被贬为同州刺史的姚崇, 准备重用其为宰相。姚崇向玄宗提出了十项治国建议(此即史书所称《十事要》)。其中, 大部分内容都与用贤人、远谄人的内容有关, 如宦竖“不与政”; 外戚“不任台省”; 佞幸之徒触犯法律, “不能以宠免”; 禁止“贡献以自媚于上”; 皇帝对大臣应“接之以礼”, 不得“褒狎大臣, 亏君臣之严”; 臣子应能够“触龙鳞, 犯忌讳”; 外戚

¹ 如李贽在《藏书》卷五十九《贼臣传·李林甫》中称: “荡覆天下, 林甫为之也。”

² 如吕思勉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说: “唐代天宝之乱, 原因孔多, 边兵之重, 要为其大。”(《隋唐五代史》上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第185页)

不得掌权，以历史上外戚乱政的教训“作万代法”³。玄宗统治前期，基本按照姚崇所言，亲贤臣，远小人，纳忠言，拒谗佞，形成了较为开明的政治局面，为“开元之治”的到来奠定了政治基础。

随着国势的兴盛，玄宗骄奢思想滋长，奸佞逐渐得势，而贤臣日益被疏远。胡如雷先生在分析“开元之治”唐玄宗用人问题时指出，开元初期君子当权，小人失势；中期奸佞、忠贤并存；后期直臣失权而奸佞猖獗，⁴谄佞之风最终导致了天宝之际的“安史之乱”。玄宗统治后期权倾一时的李林甫、杨国忠和安禄山等人，是导致“安史之乱”的三个重要人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杰出”本领，就是善于谄佞。

李林甫阴险狡诈，极善谄佞之术。他从一个小小的千牛直长，升至位极人臣的宰相，靠的就是谄佞之术。李林甫利用其舅的妹婿与当朝权贵源乾曜之子相善的关系，“求为司门郎中”，源乾曜虽然知道李“无学术，仅能秉笔”，不堪此任，但还是连升他为御史中丞。李林甫利用御史中丞的身份，“多与中贵人善”，当时武惠妃“特承恩遇”“爱倾后宫”，李林甫便向武惠妃献媚，支持惠妃之子寿王为太子，得到武惠妃的信任，“阴助之”。李林甫为讨好玄宗，可谓费尽心机。他设法结交宦官与皇帝后宫，以探听皇帝的动静，事情无论大小，李林甫大都能知道。因此，每次当面奏报，总能符合皇帝心意，很快得到玄宗的赏识。他“巧伺上意”，以谗言中伤敢于直言进谏的中书令张九龄，使张被贬，自己则如愿以偿地当上宰相。李林甫登上相位后，忌贤妒能，“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⁵李林甫善于“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朝臣们都“畏之侧足”。就是这样一位奸相，竟久居相位达十九年之久，终于“养成天下之乱”，可是玄宗却一直“不之寤也”。

6

继李林甫为相的杨国忠，也是一个善于“窥探君意好恶而迎合之”的谄佞之徒。此人原名杨钊，“不学无行”，只因是杨贵妃的从祖兄，通过“走后门”送礼得以“侍享禁中”，靠裙带关系和谄佞之术得官。杨国忠在任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时，发觉玄宗喜欢财利，于是“大事搜刮，以聚敛骤迁，一年中领十五余使”。他靠盘剥百姓取媚于上，很快升迁为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恩幸日隆”。杨国忠以谄佞得官，自然也会要求别人这样谄媚于他，对不谄媚者不管贤、奸，一律进行打击和排挤。安禄山正是因不买他的账，他才以私愤，“数以其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因此，使安禄山“决意遽反”，遂酿成了为患八年的“安史之乱”。

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原本也是受到唐玄宗极度宠信的谄佞之人。安禄山为河北节度使时，御史中丞张利贞前来巡访，他百般献媚，并用金钱财物贿赂其左右，因此，张利贞回朝后，盛言安禄山可用。此后，凡来河北的朝廷使者，安禄山一概以此法相待，使者回京后，均称安禄山可用，从而引起了唐玄宗对他的重视。从此，安禄山官运亨通，很快被调入朝中。有一次，他对唐玄宗表忠心说：“愿以身为陛下死。”玄宗感动之余，命令他见太子

³ 《新唐书·姚崇传》卷一二四载：“崇因跪奏：‘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来任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褒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因以忠被罪，自是净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

⁴ 胡如雷：《唐“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探微》，《历史研究》1994年1期

⁵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一

⁶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

不拜。安禄山故作糊涂说：“臣不知太子何官。”玄宗告诉他太子是将来继承帝位的人，安禄山回答说：“臣愚，只知陛下，不知太子。”杨贵妃得宠后，他认比他小好多的杨贵妃为母，每次入宫拜见，都是先拜妃再拜帝。玄宗怪而问之，安禄山说：“我们胡人都是先拜母后拜父。”这些“安禄山式”的、极为“到位”的谄媚之言，大得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欢心。由于安禄山善于取悦皇上，得到了玄宗的信任和重用，成为专权北方的蕃帅。就在安禄山阴谋叛乱之际，玄宗仍对其深信不疑。

玄宗统治后期，奸人用权，吏治腐败，社会风气日益堕落，谄佞之风日益猖獗。综观之，当时谄佞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献珍奇。开元元年（713年），姚崇向玄宗“献十事”时，其中有一条：禁止“贡献求媚”，说明当时地方官吏向君主贡献物品，以讨君主欢心之风已相当严重。玄宗后期，此风愈加不可收敛。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因献珍奇，被封为户部尚书；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因所献精美，位加三品；广陵长史王翼亦因此入为户部侍郎，于是“天下从风而靡”。当时，皇室贵戚向皇帝进献也成风气，玄宗还专门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献使，贵戚进献的水陆珍馐奇贵无比，一盘之费相当于“中人十家之产”。玄宗后期，朝廷骄奢之极与社会谄佞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称祥瑞。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都极力宣扬“君权神授”。但现实中的帝王往往腐败堕落。为了调节统治，儒家士大夫设计了祥瑞灾异说，宣称君主行天道，上天就会奖赏；违背天道，上天就会降罚，赏罚的直接表现就是祥瑞和灾异。称祥瑞成为谄佞者获得君主宠幸的一条捷径。玄宗统治后期，“遵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如“太白山人李浑等上言见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记圣主福寿之符”。又如“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见玄元皇帝⁷，言宝仙洞有妙宝真符”。诸如此类，“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人还“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大得玄宗欢心。史书称玄宗后期“君诞妄而臣佞谀”⁸，可谓恰如其分。

上尊号。玄宗时，为加强君主的权威，在帝号之外增设尊号。群臣争相为君主上尊号，这种集体拍马屁的行为，无非是歌功颂德以求媚。给玄宗所上的尊号，起初是“开元神武皇帝”，后又加尊号“开元圣文武皇帝”，再后来是“天地大圣宝文神武应道皇帝”，最后称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武证道孝德皇帝”。尊号越来越长，誉词越来越美，这恰恰暴露了当时帝王的虚骄情绪与臣下的谄佞之风严重到了何种程度。

进谗言。如果说献珍奇、称祥瑞、上尊号等是取悦君主、邀功取宠，那么进谗言则是为了排斥异己、专恩固宠。李林甫之谗王忠嗣，杨国忠之谗哥舒翰等，皆属此类。这种谄佞方式的危害最为严重。它常常隐瞒真相、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夸大其辞，甚至无中生有，造谣中伤，对政治稳定和社会风气产生极坏的影响。

从这些谄佞方式看，谄佞者有自觉的、有不得已的，有公开的、有秘密的，有个人的、有集体性的，花样翻新，目的都是一个，即取媚专制君主。上行之，下效之。政治上层这种争相谄佞君主的做法，鼓动起社会上的逐级谄佞之风。这种日益蔓延的谄佞之风，使唐朝盛世逐渐变得危如累卵，而当局者却多不自知。

二

玄宗后期的谄佞之风，给唐王朝的统治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危害，使盛唐一步步地深入衰弱的深渊。具体地讲，谄佞之风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助长骄奢之风。玄宗统治前、后期，表现判若两人。他前期能够节俭治国，励精图治；后期则不思进取，耽于享乐。史载，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

⁷ “玄元皇帝”指老子

⁸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一，玄宗天宝四载正月朔三省注

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⁹一副坐享太平之态，毫无前期积极进取之心。玄宗自以为国家富足，“视金帛如粪壤”，对宠臣赏赐无度，“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¹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整个统治阶级都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开元、天宝之际，地主、官僚和贵族大肆兼并土地，大批破产农民或逃亡山林，或沦为地主庄园的佃农。贫富分化加剧，阶级矛盾尖锐，著名诗人杜甫所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为求边功，玄宗还不断对周边用兵，频繁的战争一方面消耗了国家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激化了日益恶化的社会矛盾。唐玄宗是从残酷的政治角逐中登上皇帝宝座的，一贯“轻于用武”。早在开元二年（712年），玄宗就不顾大臣的劝阻，派军进攻契丹，结果唐军大败。到了开元末年，随着国力的增强，玄宗的黠武思想日益膨胀，“明皇蔽于吞并四夷，欲求一切之功”。¹¹自天宝以来，“师旅数起”，屡次作毫无战略价值的军事出击。如为了夺取吐蕃石堡城（今青海湟中西南），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杨国忠为求边功，策动了对南诏的战争，前后死亡20多万人。其他如安禄山之败于契丹，高仙芝受挫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东南的江布尔城），都损失严重。“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极大浪费，庞大的军费开支，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矛盾；同时，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而中国无武备，造成外重内轻之势，埋下了动乱的种子。

对此，司马光有精辟的评论：“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后患，殚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欲使前辈莫能及，后无以逾，非徒娱己，亦以夸人。岂知大盗在旁，已有窥窬之心，卒致釜鬲播越，生民涂炭。乃知人君崇华靡以示人，适足为大盗之招也。”¹²“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¹³

堵塞忠正言路。玄宗前期比较能听取不同意见，鼓励直言而反面对面谏，先后重用姚崇、宋璟、韩休等贤相，使国家出现了“开元之治”。如韩休为相，守正不阿。有人劝玄宗：“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玄宗回答：“吾貌虽瘦，天下必肥。”“吾用韩休，为社稷，非为身也。”但到后期，玄宗志得意满，其奢侈之欲胜过求治之心，拒谏饰非，喜谄悦媚。大臣们如有不同意见，玄宗辄“不悦”、“不喜”、“不快”，且常喜以谬赏，怒而滥惩，与前期大不相同。如天宝六年（747年），玄宗让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攻打吐蕃石堡城，王忠嗣认为石堡险固，吐蕃倾全国之力防守，如果顿兵坚城，必然会造成巨大的伤亡，所以他建议“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久镇边关的王忠嗣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可是玄宗听后“意不快”。贪图边功的董延光顺承上意，主动请兵。玄宗命王忠嗣分兵助战。董延光损兵折将，久攻不下，“言忠嗣沮挠军计”，李林甫乘机诬陷王忠嗣“欲拥兵尊奉太子”。玄宗大怒，王忠嗣险些丧命。¹⁴天宝八年（749年），玄宗又命哥舒翰帅兵攻吐蕃石堡城，“唐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之言”。¹⁵

君主既不喜听逆耳之言，谄佞之臣必会狐假虎威，助纣为虐。李林甫专权用事之时，竭力“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¹⁶当时，有的大臣向玄宗进谏，李林甫竟明目张胆地进行阻挠，并用恐吓手段杜绝言路，蔽塞玄宗耳目。他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¹⁷自此，群臣慑于李林甫的淫威，不敢再向玄宗进谏。咸宁太守赵奉璋揭发李林甫二十余条罪状，被李林甫

⁹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

¹⁰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

¹¹ 《唐鉴》卷五

¹²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四

¹³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

¹⁴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十一

¹⁵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

¹⁶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

¹⁷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

得知，“状未达”，赵奉璋便被逮捕，“以为妖言，杖杀之”。于是，无人再敢上言李林甫之罪。有相如此，唐玄宗自然再难以听到臣下真实的声音。

安禄山的叛乱图谋，许多大臣都有察觉，一再向玄宗提出。如张九龄即曾多次进谏，玄宗均不予理睬。太子李亨也认为安禄山必反，上言玄宗。玄宗亦不听。为了显示自己对安禄山的信任，玄宗还把言安禄山造反的人绑起来送给安禄山，由他处置。于是，虽然人们知道安禄山将造反，但都不敢进言。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出逃至咸阳，有一名叫郭从谨的老者进言说，安禄山蓄谋叛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有告发者往往被杀，使安禄山阴谋得逞，导致天下播越。他还说以前宋璟为相时，“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但是，玄宗后期，“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连老百姓都知道会有叛乱发生，但玄宗为谄佞所蔽，对于危机竟丝毫没有察觉。玄宗惭愧地说：“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¹⁸

导致用人失误。历史表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治世、盛世，都离不开圣君贤相的努力，如汉初的“萧曹”，唐初的“房杜”，玄宗前期的“姚宋”；而衰世、乱世，都必定有昏君奸人的作祟。用人是否得当，常常是中国封建社会兴衰的关键因素。

古代中国是一个重人治、轻法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最容易产生谄佞之风，盛则必会排斥刚正忠直之士，所谓忠正君子与谄佞小人如“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¹⁹一言九鼎的皇帝老儿，一旦被谄佞之言所遮蔽，就会宠信谄佞而打击贤能，从而导致用人失误。玄宗后果，正是如此。

唐宪宗问宰相崔群，玄宗之政为何“先理而后乱”？崔群回答说：“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²⁰崔群这段话揭示了玄宗后期因用人失误而导致的严重后果，可谓一语中的。

玄宗时期，奸佞者为专位固宠，打击贤能之事甚多，这里仅举两例。一是天宝六年（747年），玄宗“欲广求天下之士”，并降旨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以备录用。这件事引起了李林甫的恐慌不安，他惧怕“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便对玄宗说：“举人多卑贱愚瞽，恐有俚言污浊圣听”。玄宗听信李林甫的话，便改变成命，又下令郡县长官，对士人先行“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而后再由尚书省“试以诗、赋、论”。在李林甫的干预下，结果是全国“无一人及第者”。李林甫还上表玄宗，恭贺“野无遗贤”。²¹这完全是一派胡言，而玄宗却听之信之。二是安史之乱起，在叛军的铁蹄下，那些敢于奋起抵抗、真正为朝廷效命的，大都非平时显耀者，如颜真卿、张巡、许远、张兴等。因为平时显耀者多为谄佞有术，而忠直之士多不为此，所以难于显达。当“落难”后的唐玄宗听说颜真卿抗敌事迹后，有“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之叹，其因亦在于此。

掩盖危机真相。掩盖矛盾，报喜不报忧，是谄佞之徒邀媚于上的重要手段。那些把真相上奏皇帝者，往往会受到他们的诋毁陷害。玄宗后期，社会危机四伏，军队问题、政治矛盾等均由此而被掩盖。如，天宝十三年（754年），水旱相继，关中大饥。玄宗担心久雨伤农，杨国忠为掩盖真相，取“禾之善者”献给玄宗说：“雨虽多，不害稼也。”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谎言，以为无事。扶风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灾，国忠“使御史推之”。于是，“天下无敢言灾者”。²²

天宝年间，在全国的武装力量布署上，出现了外重内轻的严重局面，军队问题十分突出。

¹⁸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

¹⁹ 《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唐纪六十一

²⁰ 《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唐纪五十七

²¹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一

²²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

“府兵日益堕坏，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复点补”，“府兵者皆逃匿”，以致“无兵可交”，“其彍骑之法，天宝以后，稍以变废，应募者皆市进负贩，无赖子弟，未尝习兵”，“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²³军队建设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玄宗却一无所知，仍“以为天下无复可忧”，依然耽于享乐。天宝十载（751年），受杨国忠举荐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于泸南，士卒死者6万人，仲通“仅以身免”，而杨国忠却“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

统治者的骄奢与麻痹，给一些有政治野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如安禄山受到玄宗宠信后，被委以重任，任命为平卢节度使（治营州，今辽宁朝阳），兼范阳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市）和河东节度使（治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及闲廐、群牧等使。当时，北方三镇重兵全部为安禄山所掌握。安禄山见唐廷承平日久，政治腐败，武备废弛，因而阴谋叛乱以夺取天下。为了掩盖自己的叛乱阴谋，他对玄宗百般献媚，借以表示自己忠于唐廷，以获取对他的信任。安禄山知道玄宗喜边功，屡次诱骗奚、契丹来会，然后加以坑杀，动辄数千人，来迎合玄宗所好。玄宗不明真相，而乐被人欺，真可谓“谀”令智昏。

造成决策失误。谄佞者大多是只顾眼前利益的小人，他们关心的是一己之私利，对上“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君主听信谄臣之言，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决策。如李林甫为堵塞边帅入相之路，向玄宗进奏，力主用胡人为将。玄宗既求边功，又担心边帅与廷臣相勾结，李林甫的建议正合其意，因此多用蕃将为边帅，一改唐兴以来，边帅“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的做法，“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对安禄山更是宠幸有加。这是造成“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²⁴

安史之乱发生后，如果玄宗能沉着应对，盛唐之衰也许还有挽回的余地。但既使是在动乱之后，玄宗也一直没有走出谄佞之风的影响，一再地出现决策失误，几至亡国。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取道河北，向唐东、西两京进袭。叛军长驱直进，攻占了东都，封长清与高仙芝拒敌失利，退守潼关，准备据险抗击，给唐廷赢得稳定局势、调集兵力的时间。但玄宗听信宦官边令诚的谗言，斩了封、高这两个富有作战经验的战将。玄宗斩封、高二人后，以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将兵驻于潼关。安禄山进攻潼关受阻，士气低落。而唐军援军陆续到达，形势向有利于唐廷一方发展。但是玄宗求胜心切，轻信杨国忠的片面情报，下令哥舒翰出关，进攻安军，以收复陕州洛地。孙子说：“不知进而谓之进，是谓縻军。”指的正是唐玄宗这类做法。在玄宗的一再催促下，哥舒翰率兵出关，导致潼关失守。失去潼关，长安门户大开，很快陷落，玄宗只好仓惶奔蜀。“安史之乱”给予唐王朝毁灭性的打击，东京洛阳、西京长安惨遭安史叛军洗劫，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藩镇势力崛起，并成为影响唐朝后期安全的主要问题，致使强盛的唐王朝骤然而衰，江河日下。

唐玄宗在对安史之乱的判断和决策失误证明：军事斗争容不得半点谄佞之风存在，因为这种风气必将使国家付出巨大代价，而且其危害决非平时可比。如果说平时因谄佞之风造成的损失尚可弥补的话，那么在战争中造成的恶果，常常是无法估量、无法挽回的。

综上所述，谄佞之风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的因果链：谄佞之风——统治者骄奢——堵塞言路——用人失误——谄佞得势——掩盖危机——错误决策，这几个方面又构成一个“危机共振”的互连网，从而导致国势衰颓，直到灭亡。玄宗后期的社会大动乱和盛唐的衰弱，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产生的。

²³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

²⁴ 黄仁宇先生此说持怀疑态度，认为“有牵强附会的嫌疑。真与失真不说，其提出的见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传闻来解释很多组织制度上的大问题。”（《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5页）

三

玄宗后期的谄佞之风，不是这一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中国历代，无朝不有，只不过各个时期谄佞程度不同、危害大小有异罢了。从历史上看，谄佞之风一般在各朝建国初期即以兴起，而其盛行则多在王朝的盛世和末世阶段。当王朝兴盛之时，统治者往往会因盛而骄，因富而奢，享乐思想滋长，从而亲近谄佞。于是，谄佞盛，则国运衰。如果统治者再不思振兴，或无力振兴，君臣昏庸，苟且偷生，仍沉溺于谄佞之风而不能自拔，结果必将是走向覆亡。

唐玄宗执政前期，任用贤相，革除积弊，励精图治，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唐朝达到鼎盛时期。史载“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储粮，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²⁵；粮价低廉，物资丰盛，全国各地商贾云集，“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²⁶。唐朝著名诗人杜甫有诗赞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小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²⁷真实地描绘了开元时期的盛世景象。

“开元之治”的局面，一方面使玄宗君臣志得意满，滋长骄奢与享乐思想。开元天宝之际，奢侈之风盛行，物欲横流，士风堕败，为谄佞之风的形成提供了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相对充裕，也为奸佞盘剥百姓以媚上提供了物质基础。

如果说“开元之治”为谄佞之风提供了客观条件，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则是滋生谄佞之风的制度根源。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一种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专制君主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享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握有最高的国家权力。君主是封建国家统治机器的轴心，强调“尊王”大义，维护中央权威，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中心内容。“尊天子，一制度”的思想产生先秦时期。秦统一六国后，封建专制君主制度正式确立。秦始皇把立法、司法、行政权力和军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国家事务的最高主宰，“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秦汉以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一直沿用。

君主专制的基本特征是君主个人独裁专制，君主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君主称为至尊，受到臣民的顶礼膜拜。秦相李斯认为君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²⁸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说：“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²⁹又说：“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矣，失恩则民散矣。”³⁰宋儒陈亮说：人主之职是“辨正邪，专委任，明之大体，总权之大纲。”³¹这些论述反映了古人对君主权力独操、决事独断的认识。

专制君主为了巩固统治，在选人用人上首先考虑的不是有才无才，而是可靠不可靠。为了获得君主的好感和信任，臣下总是想方设法讨好君主。皇帝身边的近臣、贵戚、宦官等人，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常常受到宠信。这些人因谄佞而得势，自然要求其下级也对他谄媚顺从，因而形成逐级谄佞，遂致成风。这是最可怕的。此风一成，纵是金石，也难抵其销蚀。久而久之，国必将不国矣。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常常把李林甫、杨国忠和安禄山，作为造成盛唐衰弱的罪魁祸首。这些乱臣贼子固应受到历史的谴责，但是基于激愤的谴责不能代替理性的反思。仔细想一想，单靠几个人的力量，如何能够扭转历史的进程？实际上，这是中国史学中常见的忠奸理论模式。按照这一思维模式，国运衰败是由于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施横作恶；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国家就会重新兴旺。茅海建先生对忠奸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忠奸理论

²⁵ 元次山：《问进士第三》，载《全唐文》卷三零八

²⁶ 杜佑：《通典》卷七《食货典》

²⁷ 杜甫《忆昔》

²⁸ 《史记·李斯传》

²⁹ 《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³⁰ 《春秋繁露·保位权》

³¹ 《龙川集·论执要之道》

的实质是为专制君主开脱责任，掩盖了国家盛衰变化的制度根源。³² 谄佞之风的产生，还与专制制度下臣民的地位与特性有着密切关系。臣民的奴仆化，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专制君主具有绝对权威，臣民的生、杀、予、夺之权都操纵在专制君主手中。臣民对君主无条件服从。并且，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政治主导的一元化社会，入仕为官是臣民获取名利的唯一途径。在这样的社会中，专制君主高高在上，臣民所需要的一切，都来自并且只能来自君主的恩赐；否则，他将一无所有。不管是显赫的宰臣贵戚，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在专制君主面前，他们都是依附于王权的奴隶。他们对于专制君主，有的只是绝对地服从，完然没有独立的人格，“不仅他们的行为受到限制，精神也多半瘫痪。以至不让当臣仆，反而感到无地自容”。³³

臣民的奴仆化的后果就是谄佞性，个人善恶皆视专制君主的好恶而定。“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为了求得君主的欢心，臣下总是竭力去迎合专制君主。上之所好，一好百好，一有百有；上之所恶，一坏百坏，一无皆无，故人多谄佞，造成中国历史上多“诺诺之人”，而少“谔谔之才”。

在专制君主面前，忠谏之臣与谄佞之徒都处于奴仆与谄媚者的地位。从依附王权和获取君主宠信的角度看，他们只是争宠方式的不同，前者从理想政治的角度以忠诚赢得君主的宠信，后者则从帝王的实际人性角度以投其所好来邀得君宠，性质与方式不同，但都是依附王权的奴仆。因此，即便是曾经提出《十事要》的贤相姚崇，也时有取媚玄宗之举，这就不足为怪了。如开元五年（717年）春，太庙四室坏。当时，玄宗将幸东都，便问宋璟、苏頌，二人回答说：“陛下三年之制未终，遽尔行幸，恐未契天心，灾异为戒；愿且停车驾。”又问姚崇，对曰：“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岁久朽腐，而坏适与行期相会，何足异也！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百司供拟已备，不可失信；但应迁神主于太极殿，更修太庙，如期自行耳。”玄宗大喜，赏赐姚崇绢二百匹。此后对崇恩礼更厚，“有大政辄访焉”。右散骑常侍褚无量上言玄宗，隋文帝富有天下，迁都时怎么会用苻坚的旧木材建太庙呢？“此特谀臣之言耳”。又如太子宾客薛谦献武后所制《豫州鼎铭》，鼎文末云：“上玄降鉴，方建隆基。”以为这是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贺，且请宣示史官，颁告中外。司马光评论道：“日食不验，太史之过也；而君臣相贺，是诬天也。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³⁴

从一定意义上讲，谄佞之徒是专制君主所必须。一方面，喜欢被恭维，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性。美国总统亚布拉罕·林肯说：“人人喜欢被恭维。”专制君主自然也不例外。美国人斯坦格尔对人类的奉承行为进行了细致而有趣的研究，他认为，“自视甚高并有一定成绩的人，通常把对自己的恭维，看成是独具慧眼，而不是吹捧。”当然，恭维皇帝并不等同于谄佞，臣子对君主之间的尊崇也与谄佞之徒的媚上邀宠有质的区别。但是，喜欢被恭维的本性，无疑使谄佞之徒总是能够轻易地找到可乘之机。另一方面，专制君主需要谄佞为他制造神圣的光环。卢梭说：“社会的人生活在他人的看法中。”人们总是从他人的评价中认识自我。封建专制君主不是神，而封建专制制度需要把他神圣化，非要把他尊为半人半神的“天子”。这既需要所有臣民的尊崇，也需要一些谄佞之臣来配合。在谄佞之臣夸大其辞的赞扬中，在天降祥瑞的进献中，在文武百官的顶礼膜拜中，君主才能找到自己“奉天承运，真龙天子”的感觉。因此，要根除谄佞之风，只靠个人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强有力的制约机制。

为了维护以君权为核心的封建统治，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古人设立了谏议制度。但是，谏议制度与君主专制制度，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君主对谏臣的态度具有两面性：

³²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者·生活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9 页

³³ 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02 页

³⁴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

一则需要忠谏之臣来纠正决策失误，以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二则又对谏臣的批评本能地加以排斥。一般地说，进谏者为了纠正君主的意见，常常要指摘君主的过失，这常会引起君主的不悦，甚至龙颜大怒。谏臣常常落得可悲的结局。正如《韩非子·难言》所云：“子胥善谋而吴戮之；仲尼善说而国围之；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谏臣遭殃的另一面，则是谄佞得势，正如《管子·八观》所云：“谏臣死而谀臣尊。”晋阳尉杨相如曾上书玄宗，指出“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亲”的原因是，“忠正者多忤意，奸佞者多顺旨，积忤生憎，积顺生爱，此亲疏之所以分也”。玄宗后期之所以疏贤臣而亲谄佞，原因正在于此。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说：“有权力者如不加以限制，无不滥用其权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说：“无限制权力，无限制腐败。”这应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

综上所述，玄宗后期的谄佞之风是导致盛唐之衰的重要原因，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导致谄佞之风的制度根源。要想国家兴盛，必须根除谄佞之风；要想根除谄佞之风，必须根除封建专制制度。1947年，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地方、一单位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³⁵当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新路，那就是民主。实践表明，建立民主决策和有效监督制度，是根除谄佞现象的有效途径。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历史的惯性难以在短期内消除，民主决策与有效监督制度的建设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仅仅增加一些法律条文，增加几个机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近人郑观应已认识到：“夫中国自秦汉以来，以文法治天下，科条非不密也。其奉行而持守之者，非不严且明也。及其既也，适以束缚天下之君子，而便利天下之小人。官司益多，否塞益甚，堂廉益远，积弊益深。”³⁶要除谄佞之风，要肃清封建专制的遗毒，既需要权力制衡的制度规范，又需要民主法制的观念支撑。在这两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 [1]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 [2] 杜文玉、于汝波。《唐代军事史》[M]，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 [3]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 [4] 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M]，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 [5]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兵略下》[M]，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Slandorous Prevalenc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Tang Dynasty

YU Rubo, GAO Runhao

Abstract: The so-called “Kaiyuan Prosperity” in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Xuanzong is one of the most flourishing ages not only in the Tang Dynasty but also in Chinese history. However, “Rebellion of An Lushan and Shi Siming” broke out “unexpectedly” in such a peaceful time and turned out to be a turning point of declining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its peak. Why and how it came about is approached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to explore why and how the slanderous prevalence was nourished and developed in the late years of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Xuanzong and its modes of expression and negative impacts.

³⁵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

³⁶ 郑观应：《盛世危言·吏治上》

Connections between slanderous prevalence and decline of the Tang Dynasty are revealed in order to discuss how to root it out.

Key words: The Tang Dynasty; Decline; Slanderous Prevalence; Historical Research

收稿日期: 2005-08-30

作者简介: 于汝波, 男, 1945 年生,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 研究员。高润浩, 男, 1972 年生,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 军事学博士。